杨帅. 新乡贤文化赋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实现路径［J］.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2（2）：23-32.
YANG Shuai.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constructing rural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 empowered with new rural talents culture［J］. Journal of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3，22（2）：23-32.
DOI：10.13842/j.cnki.issn1671-816X.2023.02.003

新乡贤文化赋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实现路径

杨帅
（四川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0207）

摘 要：新乡贤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具有独特的时代价值，主要包括：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人才支撑力、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社会号召力、厚植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生态净化力，而转型期农村基层党组织在队伍建设、社会号召力以及政治生态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困境，这制约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乡村振兴的能力。为破解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困境，发挥新乡贤文化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的时代价值，需要做到健全新乡贤的培育机制、发挥新乡贤文化的价值功能以及强化新乡贤文化的服务导向。

关键词：新乡贤文化；农村基层党组织；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D26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16X（2023）02-0023-10

乡村振兴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根本，农村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振兴的组织基础和政治保障。但乡村社会转型期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能力、组织能力以及服务能力等党建能力出现不同程度弱化、虚化以及边缘化，进一步制约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乡村振兴的能力。弘扬新乡贤文化、吸纳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已经成为创新乡村治理体制的重要路径，这为破解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困境提供了新的契机。《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提出村党组织领导班子应具备思想政治素质好、道德品行好、带富能力强以及廉洁自律等品质[1]，这与新乡贤的内涵品质一脉相承；《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也提出农村党组织书记应当从本村致富能手、外出务工经商返乡人员、本乡本土大学毕业生、退役军人中的党员等群体中培养选拔[2]，这与新乡贤的类型具有高度一致性。从理论上看，新乡贤文化蕴含着见贤思齐、崇德向善以及温润故土等时代特质，这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了有益的文化滋养。从实践角度看，近年来通过体制内与体制外实践，发挥新乡贤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的作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及乡村的发展取得了可喜的变化。延揽新乡贤、发挥新乡贤文化的作用助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在政治上、理论上与实践上都具有可行性与必要性。基于新乡贤文化在赋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具有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本研究从厘定新乡贤文化的范畴开启，进而阐述了新乡贤文化赋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时代价值，分析了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困境，阐发了新乡贤文化赋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实现路径，以期更好地推动农村基层党组织高质量发展。

一、新乡贤文化的范畴厘定

乡贤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乡村的一种表现形式，蕴含着积善成德、和睦有道、修身齐家济天下的文化基因。基于“要继承和弘扬有利于当代的乡贤文化”，新乡贤文化是通过重塑乡贤文化的文化生态，吸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因子，吸收区域价值理念、道德礼法、行为逻辑而形成崭新的文化形态，主要具备以下三个

收稿日期：2022-06-16 **修回日期：**2022-08-26
基金项目：福建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福建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化研究”（FJ2020ZTB049）
作者简介：杨帅，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特征。

一是新乡贤文化主体的广泛性。新乡贤作为新乡贤文化主体，类型多样、来源广泛、职业多元。从场域空间来看，新乡贤可以划分为出生于本土、成长于本土、生计于本土、奉献于本土的“在地乡贤”，出身于本土，因参军入伍、外出经商、异地求学、外地任职而在外谋事成业的“在外乡贤”，非出身于本土，但谋业生活于本土的“外地乡贤”。从新乡贤的特征来看，新乡贤可以划分为“官员型乡贤”“道德型乡贤”“文化知识型乡贤”“经济型乡贤”等不同的类别。从新乡贤培育的逻辑看，新乡贤主要分为“内生”与“嵌入”两种类型。“内生”型乡贤主要包括乡村之中有威望的致富能手、英雄人物与离退休人员，“嵌入”型新乡贤主要包括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指导员、各类社工等群体[3]。

二是新乡贤文化类型的多样性。首先，新乡贤文化中的物质部分。这主要是指乡贤、新乡贤治理乡村所留存的物质文化资源，主要包括乡贤祠堂、乡贤文化广场、乡贤故居、乡贤碑志等，还包括乡贤组织、乡贤剪纸馆、水利修缮队、老人协会、乡贤回乡创业街等平台、载体与阵地。其次，新乡贤文化中的精神文化部分。新乡贤文化承继了传统优秀伦理文化，蕴含着向上向善、正气浩然的基本元素与价值内核。再次，新乡贤文化中的制度文化部分。新乡贤是传统礼俗与现代法理的践行者，在治村实践中形成了乡规民约、乡风民俗、伦理纲常等传统民间习惯法等元素，又汲取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开放竞争等现代法治理念。最后，新乡贤文化中的行为文化部分。新乡贤在村治中通过整合各类资源参与乡村公共事务，在服务村民中实现人生的价值，在践行文化共识中成为地域文化的标杆，主要包括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扮演的角色、发挥的功能、产生的价值等方面。

三是新乡贤文化主体资源的丰富性。首先，新乡贤具有一定的政治资源。“政治型”或“体制型”乡贤是经过政党的政治录用功能进入行政官僚体制的，在官僚体制中熟悉科层制的整合、控制与管控的运作逻辑，了解政治资源的分配规范，熟谙政治场域的政治人物，洞悉政治活动的政治价值。其次，新乡贤具有一定的经济资源。新乡贤中的农民企业家、农村经纪人、农业合作社负责人、家庭农场主以及致富能人等群体在现代化浪潮中善于经营、擅长管理，具有前瞻性思维，这使得他们不仅积累了资本、资产与资金，还熟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最后，新乡贤具有一定的思想文化资源。新乡贤既承载着守望相助、自强不息、仁爱孝悌、诚实守信等传统价值理念，又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兼具传统与现代的思想文化气息。

二、新乡贤文化赋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时代价值

新乡贤文化作为乡村社会原生态衍化的基因，承继了乡贤文化的合理内核，接续了现代文明的时代元素，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结晶体，通过将新乡贤文化的优势转化为推动农村基层党组织发展的现实力量，能够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一）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人才支撑力

新乡贤是有道德品行、有社会影响、有丰富资源、有公益心并能够得到乡民认可的社会贤达，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优质人力资源。

一是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智力支持。新乡贤中的“在外”和“外地”乡贤大多在外闯荡过程中熟谙现代化理念，洞悉市场经济法则，具备改革创新意识，能够将优质的人力资源融入农村基层党组织，以前瞻性的视野为基层党建工作和乡村振兴提供新思路、新方法和新观念，壮大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先进性与提升乡村振兴的内在驱动力。例如，十三届人大代表、贵州省安顺市塘约村返乡党支部书记左文学作为新乡贤代表，突出党建引领作用，创新网络党支部和党小组等党建模式，完善监督考评制度，夯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发展根基。在他带领下，塘约村深化乡村产权改革，成立种植合作社，村庄逐渐步入全国美丽乡村行列。

二是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队伍保障。新乡贤中的返乡知识青年、新型职业农民、致富带头人大多年富力强，充满活力与干劲，能够激发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精气神”，为党组织后备力量建设供给新鲜血液和力量，增强其战斗力、生命力与生产力。此外，新乡贤能够培养储备后备干

部[4]。新乡贤通过技术支持、资金帮扶与合作经验等带动乡村青壮年群体在乡村投资兴业、谋生发展、脱贫致富，使他们能够在乡村中获得不低于甚至大大高于依靠“打工经济”所获得的收入，进而在村庄“立足脚跟”，成为党员队伍与村干部队伍的后备人才。另外，新乡贤还能够凭借其乡情、友情与亲情，发挥统一战线功能，配合党委与政府动员与引导政治觉悟高、带富能力强、群众认可的新乡贤参与村级班子换届选举，加强村级班子队伍建设。

三是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干部队伍结构。新乡贤中的“体制型乡贤”普遍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信念坚定、思想政治觉悟高，其作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干部队伍的有益主体选择，既能够延展农村基层党组织干部队伍的选拔范围，又能够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集聚人脉、信息、政策等资源要素，促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干部队伍在年龄、知识、经验等方面形成优势互补的格局，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民、爱农村的“三农”工作队伍。

（二）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社会号召力

马克思·韦伯认为权力具有强制性，权威不同于权力在于权威是一种使对象因信服而顺从的影响力，也是建构有序社会的政治基础和组织存续的基本条件[5]。新乡贤来自乡土社会，在乡村具有权威影响力，熟悉社会某一领域运作范式，其融入农村基层党组织能够增强党组织的社会吸引力，强化执政的社会基础与合法性，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社会号召力。

一是增进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群众动员力。通过整合新乡贤的社会力量，动员乡民加入乡村经济社会类组织，激发乡民在组织中协商、讨论与辩论的主体性意识，重塑农村基层党组织与乡民的利益连接机制，增进农村基层党组织与社会的联系。这不仅有利于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6]，还有利于将党建嵌入社会之中扩展基层党组织与社会的互动，在推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增强乡民的幸福福祉中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权威和对乡村的动员能力，增强乡民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归属感，在整合社会、凝聚社会与服务社会中改变农民“一盘散沙”的局面，提升乡民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组织化水平。

二是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能力。新乡贤群体社会基础好，能够得到广大乡民的认可，在竞选村委会主任时容易获得广大乡民的支持，进而有利于实现村“两委”一肩挑，破解“自下而上”的村委会选举与“自上而下”的村党组织权力运作逻辑不协调的问题。新乡贤“一肩挑”使村党组织书记兼具“双重身份”，化解了角色冲突带来的权力结构冲突，能够将乡村碎片化的党政权力整合为统一的权力结构体系以实现权力的平衡，使村委会扮演的当家人与村党组织扮演的代理人角色能够融洽，破解村党组织与村委会的制度性困境，提高村“两委”决策的效率，增强沟通交流的协调性，降低信息传递的滞后性。

三是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引导能力。新乡贤文化衍化于乡土社会内部，具有人本性、亲善性、草根性，契合民众的生产生活需求，是平衡个人、集体与国家利益的润滑剂。通过发挥新乡贤文化血缘、地缘与亲缘的优势，农村基层党组织能够在社会阶层分化中整合、协调、平衡多元价值观念、政治态度、利益取向，增强村庄社会关联，培植公共精神与消解异质文化，铸牢区域文化认同感，建构共通的文化叙事形式，形成村社内部统一的意志力与行动力。

（三）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生态净化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融通党的优良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正气充盈的党内政治文化，努力实现党内政治生态风清气正[7]。”新乡贤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为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生态提供丰厚的滋养。

一是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新乡贤文化蕴含着德善气息，有利于形成正气浩然的政治气息，濡化、涤清及消解农村基层党组织中存在的个人主义、山头主义、圈子主义等不良政治文化基因。这有利于促进农村基层党组织队伍清身洁己，以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为道德追求，以立身、立业、立言为价值导向。在福建调研时，S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J原在外投资开办了多家公司，善谋敢干，在家乡群众与镇党委的动员下返乡担任了村主干，在谈到村级重大决策时，他指出：

“现在我们按照村里面谁困难就给谁，所以我自己很清廉，我们当了村书记我们没有捞到好处，没有照顾到熟人，心里面更加坦荡。就是明白跟他们讲了，在农村一定要发挥那个党（的引领性），就是按照‘四议两公开’，不然村民可能有他们的小私心，开始要跟他们有引导性。一个村要搞好，平常开会（村民代表、党员开会），多讲一些正能量的事情是有益的。”

这说明新乡贤中的致富能人、企业家与新型职业农民大多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享有较好的社会信誉，道德品质高尚，他们返乡担任村主干能够树立起合规的人生价值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乡村腐败发生的可能，有利于保持党组织队伍的先进性与纯洁性。

二是促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作风转变。新乡贤文化蕴藏着脚踏实地、勇于担当的务实情怀，知难不畏、砥砺奋进的奋斗精神，尽忠职守、艰苦奋斗的精神面貌，有利于在市场经济浪潮中整治“四风”问题，铸牢农村基层党组织为民服务的初心和意识，永葆组织队伍的初心和本色。在谈及该地区推动“两治一拆”时，S村党组织书记J向我们介绍到：

“乡村振兴要村‘两委’合力，所有事情要在村‘两委’公开讲，定了原则，谁出面都是没有用的。我们当时‘两治一拆’每户去摸底登记，登记完村‘两委’就要受得来，哪一个要拆就定下来，勾勾了，那是没有讲金钱的。后面我们再有党员来开会也念给他们，村民代表开会也念给他们，每家每户念给他们，那个一定要拆、那个要粉刷，一点点讲的很清楚，最后我们整村开了一个户主代表会，所有户都是他（户主）一个人来，开了四次会。”

S村在J带领下，村“两委”成员走村入户，了解民众心声，做到办事公道，廉洁自律，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支持。老百姓积极投工投劳，空心房与裸房得到治理，违法建筑得到拆除。这说明新乡贤融入农村基层党组织后，通过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组织、纪律以及作风建设，能够在工作中坚持原则、勤廉公正依法办事，具有“说了算、定了干”的雷厉风行作风，构建清正廉洁形象能够获得乡民认可并积极支持党组织的工作。

三是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柔性约束能力。新乡贤文化作为一种柔性约束力量，对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有着软约束的作用，能够弥补党内政治规范所不能达及的部分，促进乡村党组织内部形成党内制度约束与柔性约束相统一，增强党内政治生态的约束效力，促进农村基层党组织以为民服务为价值目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取向，以党内政治规矩为价值约束，保障党内政治生活规范化、有序化运行。S村党组织书记J在谈及村级财务管理时如是说：

“现在做有时候我会怕，为什么会怕，我这次审计账单收据当时我们有规定，说300块钱以内的可以写收费收据的，我们当时2018年买了1个茶碗、10个杯子，还有泡的茶叶，110块钱，审计机构说不行，比如茶杯10个是5块就是5块，茶杯10个一个多少钱，你这样统筹一百块钱不行，要整改，现在很严格。现在在村里面做村主干的主要是讲情怀，2018年不想干了是镇里面拼命动员我，要我推荐两个年轻的接班，现在还接不了班，心底无私就不会怕。”

这说明新乡贤作为村干部人选基于“从纪委到审计局”的制度性规范与“讲情怀”“心底无私”等软性规范不仅能增强柔性约束效力，还能通过组织机制的引领与“乡贤”内在身份的约束，使新乡贤具备社会人与“政治人”双重属性，通过政治激励与组织势能的释放进一步激发新乡贤的报国之情、爱国之意、奋斗之志。

综上，新乡贤文化蕴含着见贤思齐、崇德向善以及温润故土等时代特质，能够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丰厚滋养。从当前研究来看，学界审视了新乡贤文化主体新乡贤助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价值意蕴。陈婉馨以新乡先进群体为例，认为新乡贤能够增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力和凝聚力，筑牢党在基层的执政根基[8]；蒲实提出将贤达人士选拔为村“两委”干部能够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生态[9]。此外，学界还建构了新乡贤助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实践路径，张紧跟提出通过延揽新乡贤以加强农村党组织的后备力量建设[10]。俞秀玲提出要加强对新乡贤的组织、教育以及管理，将新乡贤发展成为农村党组织的后备力量[11]。现有研究对新乡贤促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进行了初步探讨，这为本研究提供

了有益借鉴。但总的看来，现有成果从文化层面助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研究成果很少，尤其是从新乡贤文化角度探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成果缺乏，基于田野调查的研究成果更为匮乏。基于上述问题，本研究从新乡贤文化角度出发，基于田野调查获取访谈资料，分析了乡村振兴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现实困境并建构了新乡贤文化助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实现路径。

三、乡村振兴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的组织基础与推进乡村振兴的组织保障。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既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纵深延伸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应有之义，但转型期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不同程度困境，难以适应乡村振兴的新要求与新形势，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现状与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诉求存在张力。

（一）农村基层党组织队伍建设需要加强

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市场化的“三轮”驱动加速了乡村社会由封闭迈向开放、传统走向现代，乡村人口逐步涌入城市，村庄共同体空心化日益严重，农村基层党建面临“青年党员发展难”和“支部书记选任难”等困境[12]，转型期农村基层党组织队伍建设亟待加强。

一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干部队伍培育主体弱化。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的乡村人口数为52 582万人，2020年这一数据下降为50 992万人，2021年再降为49 835万人①。乡村人口中的大量乡村精英群体涌入城市，这不仅制约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干部队伍的选育范围，也难以选树优秀农村基层党组织干部队伍。

二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党员队伍老龄化。基于“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耕半工的农村劳动力再生产方式”的二元模式，乡村多是“留守型”人口状态，农村基层党组织党员队伍存在着日益老龄化的问题，目前全国60岁及以上的农村党员超过农村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13]，农村基层党建的组织细胞以中老年群体为生力军，战斗力与活力不足。

三是农村基层党组织队伍综合素质边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文化层次以及年龄结构不均衡，进一步制约了党组织带头人的综合素质。截止到2018年末，54.3万名村党组织书记中，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20.7%，45岁及以下的占29.2%[14]。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老龄化且文化素质偏低，这不同程度导致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存在着创新意识不强、业务不精准以及推动乡村发展能力不足等问题，其综合素质难以适应乡村振兴的新要求。在福建S村调研发现，该村支委H对于微信名片推送等相关功能的使用并不熟悉，这难以适应信息化时代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出的新要求。

（二）农村基层党组织社会号召力有待增强

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中的社会号召力有赖于稳定的社会结构支撑，但转型期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削弱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发挥作用的社会基础，制约了其凝聚、动员及引导群众的能力。

一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有待增强。在当代乡村治理中，村“两委”体现为党的治理逻辑与村民自治逻辑有机统一，具有不同的职能定位。但在实践中乡村“党政组织”在职能上存在重叠与交叉的情况，协调与融合不够。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以党代政、党政不分，致使村“两委”权责难以明确、分工不够合理，不同程度存在错位、越位与缺位的状态，这不利于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力的实现。此外，转型期党员队伍构成多样化、党内利益诉求多元化，党内思想复杂化。同时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班子结构不合理、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与村委会权责不明晰[15]，这进一步弱化了组织内部的团结协作，导致农村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难以转化为有效凝聚乡民的效能。

二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动员能力尚待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基层政权与乡村社会的二元互动模式以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推动了农民主体意识的觉醒，农民在乡村社会之中互动合作的集体经营模式演化为分散的农户经营模式，农民之间的关联度降低。特别是税费改革以后，农民与国家税费的权力与义务终止，国家试图通过粮食直补、种子补贴与综合补贴等惠农政策与农民直接接触，过去通过分担经济任务所搭建理性对话的常规性渠道丧失，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民

①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zb=A0301&sj=2020.

的联系日益弱化。人们有权利为自己选择各自的生活方式，有权利以良知决定各自接受哪些信仰，有权利以他们的先辈不可能驾驭的一整套方式来确定他们生活的形态[16]。农民的原子化状态导致农村基层党组织动员农民的能力降低，村级组织悬浮化。在福建调研时，L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C作为新乡贤代表，基于对家乡的热爱返乡担任了村主干，成为文创—旅游减贫的带头人。在访谈中，他对笔者说道：

“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人身依附关系解散，生产队大家一起耕作，后面实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反正每个人要么以个人为中心，或者以小家庭为中心，张三没有李四活的好好的，李四没有张三活的好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淡化。”

三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引导能力尚需加强。随着农业经营模式的多元化，农民兼业化日趋明显，农民在价值观念、经济地位、社会政治态度等方面差异显现，村庄社会多元化，异质性增强，农民之间的熟悉程度降低[17]。农村之中的富人阶层、中上阶层、中下阶层、贫困阶层等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多元化，这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治理功能提出了挑战，要求农村基层党组织构建利益协调机制维护多元利益的互动平衡。L村村民P如是说：

“目前村里面贫富分化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有些人还达不到生活水准，你也做人，我也做人，你拥有家财万贯，我什么都没有，大家心里不平衡，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共同点变没有了，以小范围的利益为中心来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事情，这就是农村现在的复杂性。”

经济上分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农民在政治参与上的分化、社会交往秩序上的异化，农民的行为逻辑更趋理性化与竞争性，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时有出现，乡村社会呈现“半熟人社会”特征，“乡土性”价值理念消解，社区舆论与地方性共识对村民的思想与行为调节弱化，乡村之中的征地拆迁、土地调整、经济纠纷等矛盾屡见不鲜，这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对农民思想、行为引领和协调的困难，农村基层党组织整合多元利益成本增加。

（三）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生态尚需优化

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生态形塑受到乡村传统规范与现代多元价值观念影响。乡村传统的不良政治文化因子以及现代“经济人”属性进一步给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生态优化带来了挑战。

一是传统不良政治文化的存续易使乡村党组织政治生态异化。传统乡村社会基于“差序格局”形成的社会权利文化网络实现乡村“无为而治”，乡土中国通过“长老”诉诸礼治维持乡村社会秩序。乡村“长老”的教化实际是一种教育的过程，“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18]”，广大乡民能够自觉自为地注重自身内在修养。乡土中国基于共同构建的乡村传统规范的内在自省而形成共同的敬畏之情，法律在乡村无从发生。以血缘和亲缘关系为纽带的人情文化、礼治范畴容易使农村党组织陷入人治范畴。基于此，村干部可能以“家长制”的形象构建全能式的“人治”模式，容易使“依法治理”转向“人情治理”。乡土政治文化在转型期受到传统不良政治文化基因的裹挟，可能滋生与现代法治相背离的政治因子。调研发现，L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C指出：

“目前中国在从以前人治状态转化为法治状态，还是一个过渡时期，法律有时候会受到人为的影响，在做一些事情时那些人就会享有一定的优势，我自己的职业就对我有优势，或者我的社会关系对我有一定的优势，就会认为犯一点错别人会被抓进去，而自己不会。”

二是村干部选人标准的物质化导向易使农村党组织政治生态陷入工具理性。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在市场经济中摸爬滚打，善于经营与管理，熟悉市场经济运作规律，拥有信息、技术、资本等资源的能人逐步成长起来，凭借其优先致富的经济地位能够得到乡民们的信服与尊重，在乡村之中拥有绝对权威。为改变乡村经济落后的局面，推动村民脱贫致富，在先富带后富口号的引领下，部分农村地区开始动员“经济能人”“富人”担任村干部。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主要聚焦于能人的经济标准，寄希望于其改变乡村落后的面貌，可能忽视“经济能人”的政治标准与德、廉、勤等标准。部分村干部可能缺乏必备的道德品行，选任村干部动机不纯，走上村干部岗

位主要是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以更好地为自己的资本下乡铺路，将自己的能力与权力负面结合，舍本逐利，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公私不分，失去自我约束，缺少外在制约，就会逐渐自我膨胀，开始为所欲为，损公肥私[19]。

四、新乡贤文化赋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实现路径

由上可知，新乡贤文化对于农村基层党组织队伍建设、社会号召力提升、政治生态涵养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人文社会价值。破解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困境，充分发挥新乡贤文化在助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的时代价值，增强新乡贤文化引领和服务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一）构建新乡贤的培育机制，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队伍建设

新乡贤群体作为乡村社会的精英群体，要构建相应的培育机制使新乡贤与农村基层党组织队伍建设有效契合。通过健全体制机制使新乡贤能进能出、能上能下，提高新乡贤作为农村基层党组织队伍培育对象的效率。

1. 完善选拔机制保障党组织党员队伍的先进性

坚持新乡贤标准与党员标准相统一。注重“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选拔新乡贤，通过组织吸纳的方式将新乡贤群体中政治意识强、信仰坚定、务实为民、理论政策水平高的新乡贤发展为党员，促进党组织党员队伍建设的社会性与政治性相统一，保障农村基层党组织党员队伍的先进性与纯洁性。

2. 健全后备干部培养机制加强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

亨廷顿指出：“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制度必须具有将现代化造就的社会势力吸收进该体制的能力”[20]。为此要坚持内培与外引相结合。一方面，注重从大学生村官、第一书记以及在编党员领导干部等体制型新乡贤入手，通过组织嵌入的方式选派体制型新乡贤担任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另一方面，重视在新型职业农民、致富能手以及乡镇企业负责人中选拔领头雁。通过以组织动员激发新乡贤的桑梓热情。以民间信仰激活新乡贤的主体意识，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延揽体制外新乡贤返乡，增进新乡贤担任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的责任感、归属感与自豪感。此外，注重程序上的合法性，依法赋予新乡贤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通过法定程序使新乡贤担任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加强对新乡贤的业务培训，使新乡贤能够具备胜任岗位的实际能力。另外，规范新乡贤的权利与义务，完善监督管理机制，避免村民自治衍生为寡头政治，异化为精英俘获。

3. 建立激励机制激发服务党组织建设的责任感

在物质激励方面完善新乡贤返乡投资兴业的政策保障与软件配套措施，在资金保障、项目回引、税收优惠等方面予以倾斜。在精神激励方面营造尊贤、崇贤、爱贤的文化氛围，形成学习乡贤、崇尚乡贤、争当新乡贤的价值导向，激发新乡贤服务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名誉感和价值感[21]。另外，建立健全从新乡贤群体中选拔“两代表一委员”的制度性渠道，提高新乡贤的晋升空间。

（二）发挥新乡贤文化的价值功能，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社会号召力

内生衍化的文化力量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社会号召力提升的关键环节，要赋能新乡贤文化价值功能的转化以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向心力、引领力和组织力。

1. 发挥回报桑梓功能畅通党组织的服务与群众需求的渠道

新乡贤常常念兹在兹、温润故土、回报乡恩，与乡民保持着密切联系，明晰乡民需求，能够对乡民需求形成靶向响应，形成订单式需求服务模式，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服务供给能力转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以及满足感。积极搭建乡贤组织平台，畅通新乡贤参与乡村事务的组织渠道。一方面，充分发挥乡贤组织智库的角色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言献策，实现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服务乡民“最后一公里”中科学决策；另一方面，以乡贤组织平台聚拢乡贤资源和民情民意，畅通群众需求利益表达的渠道，保障农村基层党组织民主决策，定位好其与群众需求的契合点。

2. 发挥示范引领功能完善党组织的领导与基层自治的协同

建构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与新乡贤的引领

相结合的机制，使二者相向而行、相辅相成。通过新乡贤协调耦合农村基层党组织，构建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下基层村民自治的良性发展，推动形成以农村党组织为核心、村民自治为基础、村民为主体、乡村社会组织为补充的多元协同共治的制度化、民主化、法制化的乡村治理模式，坚持乡村治理的实质性参与和程序性参与相统一，最大限度调动乡村治理主体的能动性，扩展乡村公共利益的协商空间。构筑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下的新乡贤参与乡村基层自治的体制，通过加强党小组代表、村务监督委员会、村民大会等基层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建设和民主参与制度建设，形成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与基层自治的有效协同，增强党组织的社会影响力[22]。

3. 发挥利益整合功能增强党组织的协调与社会组织的耦合

通过将新乡贤、党员嵌入乡村经济组织、社会服务组织、文化组织，实现党组织的引领与乡民利益的协调耦合，重构农村基层党组织与乡民的利益联结机制，有利于实现组织的“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全覆盖”。通过整合组织内部的话语体系实现利益博弈的均衡化，激活农村基层党组织外围组织的网格功能，发挥党组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降低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成本。

（三）强化新乡贤文化的服务导向，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生态

营造良好的政治文化是形塑党内政治生态的基础和前提。新乡贤文化是保持党肌体健康的有力武器，通过制度、精神、行为等资源转化，促进农村基层党组织严明党的政治纪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守党的政治制度。

1. 通过制度文化理念推进党组织的监督执纪建设

新乡贤文化的制度文化理念是指乡贤世代赓续相传下来习惯法与现代法治原则，如现代的契约规范和市场规约与传统的乡规民约和家规、族谱。首先，弘扬新乡贤文化制度理念中的规矩纪律，行为准则、处事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畅通建言献策与批评监督的渠道以加强从严治党[23]。”乡村可设置乡贤村务顾问与党建指导员或邀请其加入村务监督委员会，经常听取新乡贤关于村级事务的意见与建议。村“两委”要进一步促进党务、村务与村“两委”近期工作情况的公开，自觉接受新乡贤的监督。其次，发挥乡规民约的作用。完善乡规民约，将农村基层干部政德要求纳入其中，要求其不仅要具备村民的价值行为规范，更要具备基层干部的行事规范，增强组织纪律性，形成对于农村基层干部“有所为与有所不为”的柔性约束。

2. 挖掘精神文化内核厚植党组织的廉政文化氛围

通过“贤”的引领，“能”的带动，使干部队伍廉以修身、严于律己，促进农村基层党组织自我净化、自我革新、自我完善与自我提高，培育正气浩然的党风，不断加强反腐倡廉建设。首先，挖掘乡贤文化中的廉政文化因子。一方面对传统乡贤文化中的专制集权、等级尊卑、官本位观念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扬弃继承；另一方面，推动传统乡贤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萃取符合当代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贤德精华，构建良性的党内政治生态文化。其次，要用好本土廉政文化资源。乡贤文化资源遗存是乡贤人生轨迹的见证与乡贤先进事迹的注脚，通过编撰乡贤书籍、收集乡贤故事、修缮乡贤故居等挖掘乡贤精神、乡贤事迹与乡贤文献文物遗存，将这些资源打造为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廉政文化广场、家风家训示范点，留住乡贤文脉供农村基层干部咀嚼与回味。依托市、县（区）等党校教育主阵地，坚持理论与实践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将乡贤廉政文化遗迹纳入学习实践，弘扬“党性要坚定、忧国要忧民、为民要真情”等价值理念，将廉政理念转化为党性修养，在润物细无声中陶冶、升华农村基层党组织党员干部的思想灵魂。

3. 加强行为文化建设促进党组织的工作作风转变

首先，搭建交流平台。依托红土初心讲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与新时代讲习所等平台开展主题报告，邀请老干部、老党员与老教师宣讲自身干事创业的历程，弘扬光荣传统与优良作风，让广大党员、基层干部学习新乡贤的先进事迹，回顾新乡贤的成长历程，感悟新乡贤的道德品质，自觉树立想干事、敢干事、不怕事的精神，摆脱懒散拖拉、急功近利、欺软怕硬等不良作风。其

次，丰富党组织建设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作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基础性工程[24]。要将新乡贤人物专题片、话剧等现代艺术表达方式与农村基层党组织主题党日活动、“三会一课”、主题教育等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化结合起来，加快推动党内政治生活健康规范，用新乡贤的嘉言懿行垂范农村基层党组织队伍，促进农村基层党组织自觉践行“两个务必”的优良作风，增强党员的党性和提升为农民群众服务的本领。要坚持开诚布公，围绕农村巩固扩展脱贫攻坚成果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等问计于新乡贤，保持政党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以社会化的方式丰富党建资源。

综上，新乡贤文化能够助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推动乡贤文化价值的现代转换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有益选择。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乡村的领导核心，如何巩固扩展脱贫攻坚成效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历史责任与使命，农村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直接关系到乡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乡贤文化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在诸多方面相契合，充分发挥新乡贤文化在助推农村基层党组织中的显性与隐性效益，既是新乡贤文化守正创新、保育时代活力的必然要求，也是稳固乡村振兴组织基础，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应聚焦的内容之一。

参 考 文 献

[1]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N]. 人民日报，2019-01-11(01).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N]. 人民日报，2018-09-27(01).

[3] 李少惠，赵军义. 乡村文化治理：乡贤参与的作用机理及路径选择[J]. 图书馆建设，2021（4）：20-28，35.

[4] 高万芹. 乡贤型顾问：新乡贤参与村干部队伍建设的功能与机制研究——以湖北省Z村为例[J].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21，23（4）：55-65.

[5] 马克斯·韦伯. 学术与政治[M]. 冯克利，译. 北京：外文出版社，1998：56-60.

[6] 董长瑞. 激发乡村振兴的组织动能[J]. 理论导报，2019（1）：60.

[7] 习近平在山西考察工作时强调扎扎实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环境[N]. 人民日报，2017-06-24(01).

[8] 陈婉馨，苏全有. 建立健全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机制——以新乡先进群体为例[J]. 学习论坛，2018（2）：50-54.

[9] 蒲实，孙文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人才建设政策研究[J]. 中国行政管理，2018（11）：90-93.

[10] 张紧跟. 延揽乡贤：乡村振兴中基层党组织带头人建设的新思路[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报，2019（6）：46-54.

[11] 俞秀玲. 当代乡村治理的新路径选择——新乡贤文化的重塑[J]. 江淮论坛，2019（6）：22-27.

[12] 李明. “青年党员发展难”“支部书记选任难”农村基层党建最突出的两个难题何解[J]. 人民论坛，2017（27）：112-114.

[13] 王同昌. 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振兴研究[J]. 中州学刊，2019（4）：14-19.

[14] 盛若蔚. 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超9000万[N]. 人民日报，2019-07-01(01).

[15] 彭汉琼. 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实践创新及理论思考[J]. 学习与实践，2012，345（11）：34-38.

[16] 查尔斯·泰勒. 现代性之隐忧[M]. 程炼，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2.

[17] 贺雪峰. 新乡土中国[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9.

[18] 费孝通. 乡土中国·乡土重建[M]. 北京：群言出版社，2016：62.

[19] 陈晓莉，钟海. 在全面从严治党中优化农村基层政治生态[J]. 理论探讨，2017（5）：126-131.

[20] 塞廖尔·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王冠华等，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129.

[21] 杨帅，李敏，刘淑兰. 培育新乡贤：乡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的新选择[J].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1，15（3）：111-116.

[22] 吴家虎. 内生权威融入式治理：体制型乡贤治村的时代价值与完善路径[J]. 社会科学家，2018（4）：57-63.

[23] 习近平.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4-10-09(02).

[24] 习近平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共同建设伟大祖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N]. 人民日报，2022-03-06(01).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constructing rural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 empowered with new rural talents culture

YANG Shuai

（*School of Marx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du* 610207,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 new rural talents culture has unique times valu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mainly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the talent support of rural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enhancing the social appeal of rural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cultivating the political and ecological purification of rural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There are different degrees of difficulties in social appeal and political ecology, which restrict the ability of rural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to lead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 dilemma of rural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times value of the new rural talents culture in rural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we need to improve the cultivation mechanism of the new rural talents culture, give full play to the value function of the new rural talents culture and strengthen the service orientation of the new rural talents culture.

Keywords: New rural talents culture; Rural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Rural revitalization

（编辑：程俐萍）